

元代私家藏书考析

方建新 金达胜

我国的私家藏书，向有优良传统。在以简牍为书的先秦时期，《庄子·天下篇》即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东汉以后，纸墨之用渐广，书之流通渐速，逮之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第一个高潮，涌现了如晋张华、范蔚、梁任昉这样藏书达数千卷至万馀卷的大藏书家。唐宋时，随着雕板印刷的发明与逐渐广泛使用，书籍的生产与流通加快，私家藏书更是蔚然成风。在宋代，有的私家藏书甚至逾十万卷，形成了我国古代私家藏书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元起朔漠，以铁甲战马而得天下，且元初战乱频仍，元末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作为文化事业的藏书也受到很大影响。比之宋与明、清，元代的私家藏书少为学术界留意研究。近几年来，我们在对中国私家藏书史的整体研究中，从一般史籍及元人文集、笔记、方志中，对元代的私家藏书材料进行了较全面的搜集、整理。迄今已搜集到元代藏书数千卷以上，有事迹记载的藏书家一百二十七人，^①并对这一百二十七人的籍贯、所在地区、家庭出身、本人仕履简历、藏书数量、来源、图书的收藏、保管及其利用等逐一进行了考察分析，从而对元代的私家藏书情况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兹特作一介绍，以祈对元代私家藏书与整个中国古代藏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疏误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元代藏书家的区域分布与基本成分

据我们分析归纳，元代这一百二十七名藏书家分布的地区如

下表：②

表一 元代藏书家的地区分布

地区	浙江	江苏	河北（包括大都今北京市）	江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陕西	安徽	甘肃	其他
人数	35	25	18	12	6	4	4	3	2	2	16

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元代疆域广阔，但私人藏书家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南，尤其是江浙与京城大都一带。其中江、浙二省的藏书家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以上。这说明随着南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的进一步南移，作为文化学术事业发展重要标志的私家藏书，也随着南移并集中于江浙一带。由此也可看到江浙在元代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表二 元代藏书家家庭出身分析

家庭出身	仕宦	世儒	富家大族	农家贫民	商贾	少数民族	不详
人数	47	35	15	9	4	14	17
比较%	37	27.6	11.8	7.1	3.1	11	6.3

表三 元代藏书家本人成分分析

仕履情况	县级以上官员	县级教官以下官吏	下级军官	未仕	不详
人数	62	12	4	40	9
比例%	48.8	9.4	3.1	31.5	7.1

表二和表三的分析，反映了元代藏书家的基本成分。同前代相比，相同的一点是元代藏书家中出身仕宦与世儒之家及本人入仕为官者所占比例较大。这有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官宦、世儒之家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较强的经济实力，注意并有条件购置图书；二是官宦、世儒之家社会地位高，有记载他们藏书著述事迹的材料流传下来。而众多的地位低下、出身贫贱、子孙又不显贵的藏书家，随着时光的流逝，便湮没无闻。但是，从表二、表三还可看到，在元代藏书家中，未仕及任县级教官以下的低级官吏所占的比例亦很大。其总数将近担任县级以上官员的人数。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贫苦知识分子。这种情况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读书、藏书是我国古代士人的普遍嗜好。元代由于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元统治者又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废除科举，堵塞了士人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的道路，使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很难在仕途上得到大的发展。这促使他们潜心于学问，以藏书、读书来逃避对名利的追逐，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所谓藏书之意“不为科名发也，不为利禄设也”，“以为反省穷理”。^③他们以保存圣贤之书，传播圣贤之学为己任，声称“宁存书种，无苟富贵”。^④一生未仕的藏书家殷庠（1306—1362），视赢金不如一经，乡人皆笑其迂。他回答说：“资多愚子孙，且贾祸，何用哉？圣贤之学，达可庇民物，穷亦善一生。”^⑤所以，读书藏书风气在元代知识分子中比较浓厚，这一同前代及后世相同的现象背后却有着不同的原因与动机，这也是元代私家藏书的一个特点。

另外，在元代藏书家中，还出现了一批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藏书家，而有事迹可考、藏书数量在数千卷至万卷以上的约有十余人。这些人大都出身世宦，本人亦担任较高官职，其中也有元开国初攻城掠地的将领。这说明蒙古族上层分子中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学习汉族文化，比较重视对汉族文化典籍的收集、

保管。但总的说来，蒙古族藏书家人数不多，与其作为统治阶层的地位来说，是不相称的。

元代私家藏书的主要来源

元代私家藏书的来源渠道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搜购。元代刻书、印书已风行于世，得书较前代更为方便，故一些儒士出身的官员、腰缠万贯的富商、聚徒教授的学者等往往不吝金钱而购求之。他们或以俸禄，或以经商所得资财，或节衣缩食，以束修之余，搜购图书成千上万乃至数十万卷。如辉州张思明（1260—1337）累官中书参政，进左丞，好蓄书。洎显贵，缩取俸钱转市四方，积书凡三万七千馀卷。蒙古人组邻尽出家资，遍游江南，四、五年内，得书多达三十万卷。济南张炤（1225—1288）之父张信，以商贾起家，资雄于乡，炤“一闻奇书，不吝百金必购之，至如残编断简亦收拾而不忍弃”。^⑥据《元史》卷一七〇《张炤传》载，炤共购书八万卷。随伯颜灭宋的安喜赵秉正（1242—1308），宋亡后，出金购书万卷，辇至家。龙泉王毅（1303—1354），世为农，幼嗜书，家贫不能置，每借市中。洎长，聚徒教授，束修之供，悉以购书，积至万馀卷。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孙赵与葺（1264—1297），生而贫，长而兵，其持家赡亲以犁耜笔砚，而得钱即置书，“广蓄精取”。

二是继承，即后代子孙在继承祖先藏书的基础上，又不断购置扩充其家藏图书。如庆元袁桷（1266—1327），“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元）以来，甲于浙东。”^⑦对此，袁桷本人曾撰《袁氏旧书目序》述之甚详：

始曾大父越公举进士时，贫不能得书，书多手抄强记……后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务置书以偿宿昔所志。其

世所未有，则从中秘书及故家传录以归，于是书始备矣……。

绍定辛卯，公自宥府归里，遂累土为堂，貯所得书。……旧书之传，距于今四世矣。^⑧

由此可见，袁氏藏书在元时之所以能甲于浙东，是与袁氏四世积书、代代相承分不开的。

元代另一名臣、著名学者真定苏天爵（1294—1352），其家也是四世为学，代代蓄书，累积至数万卷，特筑堂储之，名曰“滋溪书堂”。宋本所撰《滋溪书堂记》，载苏天爵自述略云：

吾高王父玉城翁，当国初自汴还真定，买别墅县之新市，作屋三楹，置书数千卷。再传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抄校，得书数百贮之，因名屋曰滋溪书堂，盖滋水道其南也。岁久堂坏，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损，且渐市书益之。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馀卷以归。

另外，临海陈孚（1259—1309）家世业儒，自曾祖起即筑楼藏书，至孚父又新作楼储书，至孚又新作之，“而聚书亦多矣”。再如豫章胡叔俊尝“为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书”。钱塘张模（1260—1325）“承先世之遗，图书富有”。^⑨

很明显，这种以继承祖先藏书遗产为基础的藏书家，都是出身书香门第，世为业儒者。元代立国时间不长，战争频繁，内乱纷起。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人的性命尚且难保，这些藏书家却能很好地保存祖先藏书，代代相传，并继续搜求扩充之，实在难能可贵，值得称赞。

三是抄录。唐代以前，因雕板印刷尚未发明运用，得书均靠手自抄录。自宋代始，雕板印刷流传渐广，藏书家不必全靠手抄笔录这一方法得书。但一些出身贫困的寒士，窘于资财，仍得靠向人借书，用手抄笔录的办法积累图书，元代一些藏书家亦然。如兰溪吴师道（1283—1344），未仕前，家贫无书，于是发愤手录盈数篋。松江孙道明（1296—1376？），隐于其里九峰三泖之

间，家甚贫，筑草堂三间，读书绩学，偃息其间。用前人苦志笃学，名其斋曰“映雪”，手抄书数百篇，皆小楷齐截。对此，孙道明邑人、明代著名藏书家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一六）中记载说：“孙道明家于泗泾，乃一市井人也。在胜国时，日唯以抄书为乐，其手抄书几千卷，今尚有流传者，好事者以重价购之。”

以抄录方法积蓄图书的藏书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由于经济拮据，无力购置者，而是嗜书如癖，以抄书为乐，并以此作为读书作学问的一种手段。特别是遇到善本、稿本与奇书秘本更是视若珍宝，必手自抄录不可。如汲县王天铎累官户部主事，不治生产，怡然以闭户读书为业。闻一异书唯恐弗及，“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⑩再如宋末元初著名文献学家王应麟（1223—1296）之子王昌世（1267—1327），家藏累世之书万馀卷，“毁于火，遂露抄雪纂，至忘寝食，书以复完”。^⑪

四是乘战乱得书。元代一些将领，在攻城掠地时往往并不看重金钱财物，而是独具慧眼，将被占领地的公私藏书搜罗占为己有。这是元代一些大藏书家不同于前代的特殊的得书方法。这中间以张柔、贾辅二人最为著名与典型。

张柔（1190—1268），字德刚，易州定兴（今属河北）人。金末以功累迁中都留守，行元帅府事。蒙古兵至，被执而降。柔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降蒙古后，从攻金、宋。太宗五年（1233），蒙古军队攻占汴梁，诸将士争入城取金缯，柔独入史馆收集金《实录》及秘府图书以归，遂积得万馀卷。张柔所得金《实录》于中统二年（1261）归蒙古史馆，后来王鹗（1190—1273）以此为基础，纂辑史事，为元末最后修成《金史》作了较充分的材料准备，即所谓“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⑫

贾辅（1192—1254），字元德，祁州浦阴（今河北安国）人。仕金为祁州刺史，降蒙古，从张柔征战。生平喜为学，至老，聚书数万卷，筑万卷楼藏之。郝经（1223—1275）为贾辅所撰《万卷楼记》叙其得书经过云：

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杰哄起。于是，拥兵者万焉……积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侯（贾辅）则独不然，息民保境，礼贤聚书，劝学事师而已。于是取众人之所弃以为己有，河朔之书尽往归之。故侯之万者独书焉。河南亡，众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复各万，侯之书又得万焉。淮南亡，众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复各万，侯之书又得万焉。故南北之书皆入侯府，不啻数万卷焉。⑬

另一武将巩昌汪世显（1195—1243），喜儒术，随军伐蜀还，“辇书数千卷，而图画半之”。

很明显，上述一些以元代将领为主的藏书家的这种得书方式，都是乘战乱之时，将原地方公私藏书占为己有的掠夺性行为，这是不足取的。但对照有的将领，唯以掠夺金银财物为要，余概付之一炬的做法，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图书、减少损毁的作用。至于在动乱中，将社会上遗弃无主的图书加以收藏保管，免受毁灭散失，则更应得到肯定。

以上，我们具体分析了元代私家藏书来源的几种主要渠道。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乘战乱将公私图书占为己有这种较特殊的方式外，对一般藏书家来说，并不是仅用一种方式累积图书的，而是兼而有之。或以搜购为主，又不时抄录；或继承先世遗书后，又购置、摘录；或以抄录为主，亦有求购等等。

元代藏书家对图书的收藏与保管

私家藏书，聚之唯恐不多；既聚多，又恐流失而传之不久。

故历代藏书家均煞费苦心，采取各种措施对图书妥加收藏保管。在这一方面，元代藏书家与前代藏书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有效地收藏、保管图书，元代很多藏书家承继前代藏书家的做法，专门造室筑堂置放图书，并取以表示自己情趣、志向的室名、堂名、书斋名，兼作读书治学、会客聚谈之所。如回回人马薛超吾“平生薄嗜好，好读书，所蓄几万卷，侨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辟楼鹤轩之左，悉置书于其上，而以‘书垒’名之”。于是，书垒之名闻于时。贾性之专筑一室在闾阊中，集古今图书以为燕游接客之所。王祯题其斋室名曰“市隐”。鄞县倪可与（1324—1376），家藏书万卷，扁其藏书室曰“履斋”。此种例子举不胜举。据分析统计，在我们收集到的一百二十七名元代藏书家中，有确切名称用以庋藏图书的室、堂、斋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多。

为了防止图书潮湿霉变，元代藏书家借鉴前代藏书家的经验，往往把图书藏于高楼之上，甚至专门筑楼以藏图书。如信都吴钧，晚侨居吴兴筑楼霅溪岸边，北枕苍、卞、金盖、玉几诸山，命曰“南楼”，且自以为号，置书万卷于其上。胡履辉（1295—1357），终身不仕，隐居太和（今江西泰和）禾溪，专门筑楼藏书。另一元末大藏书家杜元芳的藏书楼称“翡翠碧云楼”，庋书万卷。至于以万卷楼命名的就更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藏书家们在建造藏书室、堂、楼时，已注意到了防火安全措施。上文所述经陈孚祖孙几代修筑成的“万卷楼”藏书楼即是一例。据载，其楼“为盈者五，东西两偏皆实以书，虚其中以为宾客之所登览”。书楼“宏壮而亢爽，四面溪山，环绕如拱，下临广池，荷芰交茂”。元代另一大藏书家，维扬陈季模于所居扬子江心的马驼沙筑藏书楼，置放其家旧藏与新购得的五万馀卷图书。楼前凿池储水，楼后万竹森立。这样的建筑设计，可说是独具匠心，既做到环境幽静优美，又注意到了防

火安全措施。

元代有的藏书家在注意图书防火的同时，为了使图书免于兵祸与防止偷盗，还特地开辟石室以藏图书。钱塘张雨（1277—1348），晚居三茅观，修玄史，历记道家高士。作黄蔑楼以储古图书，又作水轩于浴鹄湾，将所系玉带出售筑玉构桥，在楼南数十步作藏书石室。集防火、防盗二用于一室，真可谓别出心裁，用心良苦。元代另一辟石室藏书的是著名史学家胡三省（1230—1302），对此，全祖望撰有《胡梅硎藏书石窖记》（引者按：胡三省号梅硎），所记甚详。^⑭至元二十六年（1289），宁波发生兵乱，胡三省将书藏于石室中得以幸免。

对于图书典籍，除了妥善收藏，保管好，防止损坏与散失外，还有个如何置放、便于使用的问题。根据历代公私藏书的做法，是对图书进行正确的分类，并编制目录。否则，书越多，寻检越困难。据现存材料，元代藏书家编制目录不很普遍，也没有如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那样的私家目录传世。但元代的藏书家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并有其特点。其中，做得最好、最有特色的当推上海庄肃。

庄肃，字恭叔，一作幼恭，号蓼塘，积书七、八万卷，自编有《庄氏藏书目》。其分类办法是，于经、史、子、集外，复列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小说六目，合为十类，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门标别之。除此之外，元代著名书法家、藏书家陆友对其众多的藏书，第其篇帙、部分类别，编成《陆氏藏书目录》。故其藏书上自经史传记，下至权谋数术、汜胜虞初、旁行敷落、百家众技之文，栢比而鳞次，井然有序。

见之于记载的元代私家编制藏书目录的还有张思明，将所积书三万七千馀卷藏于共山书院，为使览者能谱而稽之，编成《共山书院藏书目录》。^⑮袁桷将兵燹后幸存的家藏图书编为《袁

氏旧书目》，将新搜购之图书编为《袁氏新书目》。^⑩汲县王恽（1227—1304）校勘其父天铎所遗藏书数千卷，编有《王氏藏书目录》。^⑪岳飞五世孙岳自修（字德敏）编有《岳德敏书目》等。

在对图书的收藏与保管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上文介绍过的将领出身的藏书家贾辅。贾辅在战乱中得到各种图书数万卷后，筑万卷楼以贮之，郝经为贾辅所撰《万卷楼记》中，详述其分类置放图书的情况云：

楼既成，尽以卷帙置其上而为之第，别而为九：六经则居之上上，尊经也；传注则居上中，后传也；诸子则居上下，经之余也；历代史居中上，亚六经也；杂传记居中中，次史也；诸儒史论居中下，史之余也；先正文集及诸著述居下上，经史之余也；百家众流，阴阳图籍、山经地志、方技术数则居下中，皆书之支流余裔也；其法书名画则居下下，艺成而下也。栉比鳞次，高切星汉。^⑫

贾辅的这种分别类次，按类置放图书的方法，基本上是按照隋唐时形成、当时通行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加以适当改变。但作为一个人藏书家，又是武将出身，能将图书安放得如此部类分明、井然有序，实在很不容易，需要较深厚的文献典籍知识。而如此收藏置放图书，无疑十分便于保管和使用，也能防止散失。

在对图书的收藏、保管、使用过程中，元代有的藏书家还特别注意珍惜、爱护图书。如元代著名画家、藏书家赵孟頫尝作书跋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⑬这一书跋，对使用、保管图书时应注意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总结与阐述，反映了赵孟頫珍惜、爱护图书的可贵精神，为后世众多的藏书家和士人所称道、遵奉。

元代私家藏书的利用

元代藏书家、著名学者杨维禎（1296—1370）尝曰：“夫书之能藏者不难，能读者难；能读者不难，能用者难也。书藏而不读与无等，读而不用与不读等。”^②杨氏之语提出了为什么藏书，藏书为什么这样一个对私人藏书家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藏书是为了读书，更是为了能用。综观元代的私人藏书家，大部分还是能做到藏而能读，读而能用，较好地利用图书，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历代藏书家一样，元代藏书家中大多数聚书、藏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读书的需要，尤其是在所谓的“九儒十丐”知识分子地位十分低下，科举入仕之途又被阻塞以后，元代很多知识分子对由仕途发展丧失信心，比较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自娱。如昆山顾伯寿不屑于用世，年未老，辄委家事于其子，退治一室，环以水竹，中蓄琴书图画古玩之属，扁其堂曰“尊贤”徜徉宴息其间。其子德辉（1310—1369），平生亦不屑仕进，举茂才，授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筑有亭馆三十六处，扁藏书审阅之所曰“读书舍”。兰溪徐均宋末以荫任濠州定远县尉，入元不仕，“家故多书，日以史籍文章自娱”。钱塘应本（1272—1349），颇有志于宦游而弗遂，年甫三十，才由提举江浙儒学赵孟頫推荐，主教仁和县，辞不就。后归隐西湖，徜徉山水间。遇奇书必厚其值而取之，所积甚富，手不释卷，抄录成帙。此种事例也是不胜枚举。不过，在众多的不求仕进，以读书自娱的藏书家中，也有为读书而读书，只读不用之人。如一生未仕，自号青门处士的魏一愚（？—1356），“闭置一生密屋中，如处女然”，“平日危坐，阅所蓄书几万卷，然无他制作，味其旨而已。”^③但大多数藏书家还是能做到读而能用，用其藏书探

究学问，从事著述活动与整理、校勘典籍工作等。著名的有王应麟父子。应麟宋末辞官回乡，入元不仕，杜门不出，利用自家丰富的藏书，取经史诸书讲解论辩，专事著述达二十余年。所撰著作二十余种，六百餘卷。其子昌世，继承父业，对其父之著述，搜辑考订，赞助为多。家世业儒的刘传（1278—1340），遵祖训，利用家中藏书，“穷五经，尤深于《易》，推明程朱之传，复辑诸儒之言而辅翼之”。^②而浏阳刘过（1259—1327），嗜古图书，市或千金，故家藏古书甚多，皆于自校勘。乐安何中（1265—1332），“家有藏书万卷，手自校讎。其学弘深该博”，著述颇富。^③

元代藏书家藏书、蓄书的另一比较普遍的目的与用途是以书教子孙，并留传给子孙，希冀他们好学上进，“守儒为准，守身为本”^④，或学业有成，或仕途腾达。出身世儒之家的段思温（1240—1288），年少丧父，家素贫，以聚徒授业为生，损衣节食，市书至万餘卷。“尝顾而乐之，谓以此遗子孙足矣”。鄱阳显族朱明普（1259—1335），藏书数千卷，尝取古语大书屋壁曰：“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此所以识也。”后其孙坦果然于后至元元年（1335）中乡试。上文曾提及汲县王天铎日抄万字，十年累书数千卷。当有人问他，“藏书如是尚尔为”时，王天铎回答说：吾老矣，为子孙计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荣保其爵禄，不知一跌足赤吾之族；知富宝其金玉，一慢藏已为盗所目也。何若保书之为宝乎？若子若孙由是而之焉，为卿相、为牧守，为善人、为君子，上以致君泽民，下以立身行道，其在于是矣。^⑤在王天铎看来，高官厚禄、金玉钱财都不是宝，也不可靠，不足以留存子孙，只有书才是使子孙仕途腾达，致君泽民，立身行道的无价之宝。他的这番苦心也终于没有白费，其子王恽，好学属文，仕途显达，历官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学士。且继承父志，广蓄图书，

合其父所藏，聚于一舍，亦用以教子孙。其示孙箴诗云：“传家无长物，临终付青毡。有书五千卷，太平亲手编。三世无白屋，辛苦天所怜。多财只益愚，读书可希贤。”并告诫云：“近多置书家，万卷图好看。来者不一读，非贤即弃损。人果不好学，方寸如废田。”^{②⑥}

王天铎、王恽父子的例子充分反映了世代为儒的元代知识分子为子孙藏书、遗书教子的真实心理。当然，也有并非出身于世儒之家的商贾与富户，由于家庭与职业的关系，他们本人无多大学问，也不读书为学，却希望子孙通过读书取得功名富贵，光耀门庭。如庐陵贺良叔善治生产，有田岁收稻谷万石，蓄书万卷，延名师教子。鄞县胡珙（1250—1322），自曾祖至父皆未有仕籍，治田庐、生产悉有法，但他却储书并构精舍以藏之，延师儒教诸孙举子业。定海贩粮大贾乐大原，有持旧书易米济饥者，辄应之，至蓄书数千卷，以遗子孙。并曰：“吾子孙必有能读是者。”后其孙乐良果然读祖所藏之书，从名学者程端礼学，洪武初辟为定海教谕。

我国历代藏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般都惜书如命，对家藏图书不轻易出借，有的还立为家规家法，要子孙恪守遵奉。但我们在整理编次元代私家藏书材料时发现，有一些藏书家的这一观念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以书会友，接纳四方名士来访观书，探讨学术，倡益学术；有的以所藏图书为乡邻无书或少书者读书提供方便。恩州张汝卿家饶于资，生平多蓄经史，构堂贮之，号曰万卷堂。又于堂右筑文会斋，以接纳四方贤士。再如吴钩筑南楼置书万卷后，一时名士考析经史及东南民事，多客是楼。开化刘文瑞（1269—1329），中年弃仕途后，筑书塾，蓄书万馀卷，延名师以教子孙及乡里子弟。郑原善、程琚、张宗元、鲁贞皆读书其中。后郑原善、张宗元皆登第，而程琚与鲁贞皆领乡荐。许州冯梦周家多蓄书，尝买书千卷，构堂贮之，以待乡里

贫而无力购书者读用。且制定借阅规则：凡借者恣其所取，记其名若书目，读完则归而销其籍，损者不责偿，不归者遂予之，以激其后。缺者随补之。^{②7}张翥（1287—1368）为之题诗云：“不惜黄金为买书，要令弦诵被乡闾。圣贤事业千年上，经史文章万卷馀……。”^{②8}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冯梦周还捐资创建颖昌书院，梓钁《六诸图》诸书，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书善本与小学之书，为经书作注，制成书板凡若干卷，悉归之书院。其平日捐资以购买之书籍，上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下自稗官杂说，共积之数万卷，亦悉归之书院。

在元代藏书家中，如冯梦周这样开明，公开出借图书的事例虽鲜见，但将己之图书损赠地方办学者却时有所见。如《元史》卷一三四《和尚传》载，和尚子千奴，官至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致仕后，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名臣廉希宪（1231—1280），至元七年（1270）罢相后，“撤官屋以复竹林书院，予书万四千卷”。^{②9}只必（1251—1301）“尝出家藏书二千馀卷，置东平庙学，使学徒讲肆之”。^{③0}上文已提及的张思明，积三十年之书，悉归之共山书院。而张炤购书八万卷后，以万卷送济南府学资教育。赵秉正购书万卷，以其副分遣顺德、怀孟、许三郡学官。

以上这些名儒大臣将私家藏书用于兴办教育，贡献给社会的现象，在前代藏书家中较为鲜见，它大大提高了图书的社会利用率，促进了以书院教学为主要形式的元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元代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这可说是元代藏书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

注：

①参拙作《中国藏书家考略（选录）——元代部分》，载《古文献研究》第二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引文凡不注出处者，见是文。

- ②表内“其他”一栏，是指不足二人的行省及籍贯难以确定者之和。
- ③郑元佑《侨吴集》卷一〇《藏书楼记》。
- ④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十六字铭”条。
- ⑤朱埜辑《名迹录》卷三《元故殷处士碣铭》。
- ⑥俞德邻《佩韦斋文集》卷九《济南张氏万卷堂记》。
- ⑦《至正直记》卷二“别业蓄书”条。
- ⑧⑩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二。
- ⑨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中。
- ⑩⑮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王氏藏书目录序》。
- ⑪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一《王公墓志铭》。
- ⑫《金史·附录·进金史表》。
- ⑬⑯郝经《陵川集》卷二五。
- ⑭全祖望《鮑埼亭文集》外编卷三二。
- ⑮柳贯《柳侍制文集》卷一六《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
- ⑰《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 ⑲赵孟頫《读书十六观》。
- ⑳杨维禎《东维子文集》卷二一《读书堆记》。
- ㉑《东维子文集》卷二六《青门处士墓铭》。
- ㉒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四《刘传墓碣铭》。
- ㉓《元史》卷一九九《何中传》。
- ㉔《清容居士集》卷二八《陈万里墓志铭》。
- ㉕《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元日示孙阿篴六十韵》。
- ㉖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八《冯氏书堂记》。
- ㉗张翥《蜕庵集》卷四《题冯士启士可藏书室》。
- ㉘元明善《清河集》卷五《廉文正王神道碑》。
- ㉙《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作者工作单位：方建新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金达胜 杭州大学教务处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